

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

何立波



缪伯英

缪伯英1919年到1924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实现了从进步青年到卓越革命者的转变。她敢为人先，参与筹建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理想社会。她追求进步，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敢为人先 勇于探索

1899年10月，缪伯英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清泰乡，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7月，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女高师”）理化系。北京各种新的社会思潮让缪伯英大开眼界，为表达自己与旧的封建制度的决裂，她将一头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缪伯英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大学生何孟雄，通过他参加了工读互助活动，开始了社会实践。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十分流行，但其颇为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1919年底，王光祈在北京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下设4个小组，其中第三组为女子组，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缪伯英等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她为此还从女高师退学。女高师学生、工读互助团成员杨瑞璠回忆：“赞助人中的缪伯英，舍女高师学校，入女子工读互助团当团员。”毛泽东曾在1920年2月一封致陶毅（陶斯咏）的信中写道：“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

1920年3月，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正式开张营业了。缪伯英等拟定了《第三组工读互助团简章》，规定工作种类暂分为织袜、缝纫、刺绣、小工艺（制墨水、信笺、信封、帽子、手巾等）、贩卖商品及书籍五种。开张之日，她们还四处张贴“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工读互助团提出“我即是团，团即是我”的主张，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取消婚姻关系”。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原先筹集的款项很快用完，营业收入又很少。他们开办的食堂“事少人多，入不敷出”；放映电影却是“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如洗衣等生意也是经营不善，难以继。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解散，第二组随后解散。1920年8月后，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也是难以继，逐渐走向瓦解。1920年9

月，缪伯英重新考入北京女高师。

“工读互助”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进步青年来说，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他们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向往光明 追求真理

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和北大马克思主义说研究会成立后，李大钊加强了对青年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政治学系和史地系任教，所授的《唯物史观研究》大受欢迎。李大钊也在北京女高师兼课，很受推崇。当时在北大校办工作的章廷谦曾回忆：“1920年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兼课，讲授社会学和图书馆学。我爱人也是他班上的学生——不过在那时节我们还没有结婚。后来晓得那里的女学生对李大钊都很推崇。”

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大马克思主义说研究会。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在4月加入。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何孟雄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嘱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据罗章龙

回忆：“现在我有这样一些印象，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比他先参加党。何开始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他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可我们想争取他。”“缪伯英是女师大的人，我们通过她去做何孟雄的工作。”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成立。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张大雷等。缪伯英由此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在1921年中共一大之前仅有两位女党员，即缪伯英和刘清扬。在李大钊的领导下，1920年11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等40人参加，缪伯英是唯一的女团员，也是我国第一位女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由于工作的关系，缪伯英和李大钊经常接触，进步很快。缪伯英和李大钊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据支部成员王一知回忆：“参加会的还有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宇等同志，李大钊同志每次都参加会。”“每当同志们有了意见分歧、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只要李大钊同志一讲，问题就迎刃而解。”

投身革命 以身许党

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任北方区委书记，缪伯英任区委妇女部部长。1921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北京东城支部成立，这是北京

最早建立的两个党支部。其中，西城支部主要由北京女高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员组成，缪伯英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李大钊教育缪伯英等女同志，妇女运动是很重要的，但妇女不光要争女权，妇女还要争人权，还要争工作的权利。有同学问缪伯英怎么这么喜欢搞政治呢，她回答说：“千百年来女子被束缚于家庭，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可言。我们应该担当起进行变革的责任啊！”1921年4月4日，缪伯英在《申报》第8版发表《家庭与女子》一文，发出了“希望一般留心女子问题的诸君和女界中稍具知识的朋友们，切勿徘徊疑望，踌躇不定；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1921年7月，何孟雄和缪伯英结婚，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成为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途经北京时，就住在这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上学，一面从事革命工作。他们的名字中有“英”字和“雄”字，同志们就戏称他们为“英雄夫妻”。

1922年2月，缪伯英组织了香港海员工会工友后援会，并在自己任编辑的《工人周刊》上报道工运情况。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她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到丰台、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2月，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总罢工，和朱务善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到武汉活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5月，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缪伯英等共产党员。京师警察总监下令抓捕，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出京，回到长沙。1924年6月，缪伯英任长沙女师附小主事（校长），翌年3月任中共湘区妇委书记。五卅惨案后，缪伯英在长沙发动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有力声援了上海工人。缪伯英1927年10月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主任，1929年10月因伤寒不幸病逝，年仅30岁。她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

缪伯英始终坚定“以身许党”的崇高信念，“向光明的路上走”。她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妇女运动的先驱，谱写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青春之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课题“新时期高校传承红色基因研究”[2021SZXX0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研究中心）

鲁艺的创立与发展

林晓清

学校以鲁迅的名字命名，意在将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延续下去，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发挥文艺急先锋的作用，为抗日民族斗争多作贡献。

创作风气的改变

当时，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主要来自上海、北平等大城市，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特性，与无产阶级的工农兵大众在思想上存在着差距。鲁艺在办学之初提出正规化、专门化的办学方针，试图在延安复制正统学院派风格。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虽然紧邻农民的场院，不少师生却几乎不与农民往来，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农民的喜悦。他们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缺乏对工农兵的接近、了解、研究，描写的人物穿着劳动人民的衣服，却顶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孔。这种“关门提高”的方式，使鲁艺的创作极大缺乏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强调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鲁艺师生在对《讲话》精神的学习中，真正认识到：只在学院的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大鲁艺中去学习。由此鲁艺的创作风气为之一变，鲁艺师生的面貌焕然一新，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态度去从事创作，鲁艺发展走上了文学艺术民族化、革命化、大众化的道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为了实践文艺大众化，鲁艺师生们掀起了下乡、进厂、上前线的热潮。在探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汲取多种民间文艺样式加以改造、发展，创造出了一些既不离民俗原貌、又增添了文学艺术性的新的文艺样式，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入生活、面向群众、鼓舞斗志、深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

1943年春节前，由鲁艺自编自演的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上演受到各界热烈欢迎。这是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选取流传在陕北民间的一种古老艺术形式——秧歌，在此基础上创造发展出的一种集戏剧、音乐、舞蹈于一身的综合性广场歌舞表演形式，谓之新秧歌，一经演出便风靡延安。

在鲁艺秧歌队的带领下，各种深入生活、面向群众的秧歌剧纷纷出炉，从《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红布条》《拥军花鼓》等小型秧歌剧，发展到《周子山》《血泪仇》《动员起来》《牛永贵挂彩》等一批大型秧歌剧，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由此展开，有力地显示了文艺大众化的价值。

1943年底，以张庚为团长的鲁艺工作团深入绥德地区的葭县、子州、米脂采风，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不仅加深了与群众的感情，农村的现实生活更为他们提供了丰厚而生动的素材，改编、创作了一批新的民歌作品。一次无意中听到的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使马可受到启发，整理创作出了《东方

红》，直白的歌词、激扬的曲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感激和热爱之情，这首歌从陕北唱到全中国，在全国范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他们还整理创作了诸如《十绣金匾》《万丈高楼平地起》《三十里铺》等众多民歌，以朴实的文艺形式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发挥了军事力量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以古元、彦涵、力群等为代表的延安木刻家们，充分吸收民间年画的营养，创作出了一种广受欢迎的木刻版画样式。这些木刻作品，着重反映了根据地建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士兵的形象，采用中国古典版画固有的明朗、简洁的造型和色彩，使民间形式的版画取得了特别广泛的传播。它是“在黄土地上发扬光大的艺术形式”，堪称延安和解放区文艺百花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1942年10月重庆召开全国木刻展，延安木刻作品被带到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古元创作的《铜犁》受到徐悲鸿的大力称赞，赞他为“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

1945年1月至4月，根据河北阜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鲁艺集体创作了第一部现代民族新歌剧的成功之作——《白毛女》，其采用河北小调“小白菜”为主调，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西洋歌舞歌剧和五四后话剧创作的优点与特点。《白毛女》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公演，共演出30多场，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致肯定和赞扬，震动了整个延安，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之后这出歌剧还在国统区演出，广受赞誉。

鲁艺师生们遵照《讲话》“到工农兵中去”的文艺思想要求，自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出大量真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使根据地的文艺更加丰满壮大，达到了文艺为鼓动抗日、激励人心服务的目的，也成就了一代鲁艺人，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代文艺家。

（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第三研究室副主任）

鲁迅的惜书情结

张雨



鲁迅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从少年起就节衣缩食购置了不少书。成年后，读书、购书、借书、抄书、修书，一直是他极大的乐趣。他因为爱书惜书，看书前常常是先洗手，有时不小心弄脏了书就小心翼翼地弄干净。在鲁迅的生活内容里，书籍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用“爱书如命”来形容也毫不夸张。

鲁迅常给朋友寄书，朋友也会给鲁迅寄书。鲁迅寄书时总是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用牛皮纸包好，再用柔软的细绳捆结实，生怕书籍受损。有时还叮嘱朋友包书时一定要在外面用细软绳捆好，以免纸包易破而殃及书籍，因此书籍受损，鲁迅曾遇到好几次，为此十分痛惜。

鲁迅一生购书藏书万余册，其中不少是旧书。有些“众里寻

她千百度”淘来的古籍已破旧不堪，而鲁迅依然倍加爱惜。在鲁迅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盒修书的工具，那是一些简单的划线仪器，几根钢钉，一团丝线，几块砂纸以及两块磨书用的石头。鲁迅就是用这些极其平常的东西，来精心修补那些淘来的破损古籍。许寿裳（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传记作家）曾不止一次地赞赏鲁迅修书的功夫：“关于线装书，内容缺页的，他能够抄补；有破烂的，也能够拆散，修理，重装完好；书头污秽的，能用石头把它磨干净……”

在许寿裳看来，鲁迅的修书水平不亚于专业的修书人，或者说，专业的修书人也不过如此。

鲁迅“珍惜字纸”，爱书惜书的情结已深入到骨子里，这是一种对书籍的敬重，更是对文化的一种敬畏之心。

胡适的“孤本”

崔鹤同



1937年冬，在北京燕大读书的周汝昌，根据他四哥的建议，在燕大图书馆查阅了敦敏的《懋斋诗钞》，并写了一篇考证小文，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上。胡适读了这篇小品，给寂寂无名的周汝昌写了封信，信中颇多肯定、鼓励和赞赏。这封信使周汝昌喜出望外，此时他正钻研红学，便进一步向胡适求助。

研究《红楼梦》要翻阅参考大量的稀缺而珍贵的书籍和资料。周汝昌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查阅这些书，谈何容易，于是又写信给胡适，恳请他“汲引”，向胡适借阅他所藏的海内孤本脂批本《红楼梦》：“稀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

信寄出后，周汝昌忐忑不安，毕竟他和胡适素昧平生，怎能提出如此多的要求，且又向对方借“海内孤本”，更属不情之

请。倘若胡适一口回绝，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然而不久，胡适主动约见周汝昌，肯定了他所取得的成绩，也委婉地指出，做学问要虚心求证，不宜固执己见。最后鼓励他将考证《红楼梦》的工作继续下去，并慷慨答应借出价值连城的脂批本。

对此，周汝昌无比感激。由于脂批本《红楼梦》非常珍贵，且纸张已有些黄脆，周汝昌怕损坏不敢多翻，于是决定录一个副本。但由于当时正值暑假他住在乡下，时间紧迫，来不及请示胡适，只得“先斩后奏”了。开学后他给胡适写了一封“请罪”信。胡适收到信后，没有怪罪周汝昌的冒昧行为，反而很高兴，在回信中对他的做法作了夸奖。

最终，周汝昌成为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

赵朴初的聪慧

顾燕



赵朴初是安徽太湖县人，父亲赵恩彤曾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与人为善。母亲信佛，门前的水塘是她的放生池，里面放养着不少她买来的龟鳖。在这种家庭氛围中，赵朴初自小就养成了仁慈好善的品性。

1914年夏日的一天，7岁的赵朴初看到一只蜻蜓在蜘蛛网里挣扎，十分痛苦的样子。不一会儿，蜻蜓被越缠越紧，渐渐就不能动弹。赵朴初顿生怜悯之心，他转身到厨房找来一根长竹竿，把蜘蛛网耐心地挑开，将蜻蜓救出。母亲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切，非常高兴。

第二天，母亲带赵朴初去寺庙烧香。佛事结束后，母亲与师父闲谈。此时，年幼的赵朴初对佛堂上大大小小的对联十分感兴趣，东看看西瞅瞅，还时不时地念出了声。师父



潘达于捐献大孟鼎和大克鼎

付裕

清道光年间，大孟鼎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一同出土的还有形体较小的孟鼎，故将大鼎称为“大孟鼎”。同治七年，收藏家潘祖荫当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获赠大孟鼎。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村，同出者有克鼎七件，为将它们区分开来，故将大鼎称为“大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亦即为潘祖荫所得。

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大孟鼎和大克鼎一同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了保护二鼎倾尽全力。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无奈决定将二鼎再次入土埋藏，躲过日军的数次搜查，得以安然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慎重考虑，潘达于认为“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1951年，即向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无偿捐献青铜器大孟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贵文物200余件。潘达于在书信中写道，全家心愿是国宝“贮藏得所、

克保永久”。

1951年10月9日，《新民晚报》刊登消息《潘达于捐献两古鼎》，提到“潘家以其累世珍藏古物捐献政府，不但表示其对政府的热爱和信赖，同时对于新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贡献。”

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馆伊始，历经劫难的二鼎得以展出，轰动全国。1959年，大孟鼎应征北上，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潘达于那时生活并不宽裕，还参加了里弄生产组，学习在玻璃上钻孔。当时，政府曾奖励潘达于一笔钱，她还把这笔钱也捐给了抗美援朝将士。其后，潘达于又陆续捐出大量藏品，如1956年捐赠99件字画、1957年捐赠150件字画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沈周《西湖名胜册》、弘仁《山水卷》、倪元璐《山水花卉册》等都是他的捐赠。

潘达于将祖传文物典籍悉数捐赠给国家，自己的生活却一直过得十分简朴。1996年，当记者采访时年91岁的老人时，言及当初捐赠的动机，老人大声说：“因为相信共产党呀！”